



商代妇好鸮尊。

商周 象征地位的尊和爵

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饮器为尊、爵、觥(gōng)、饔(lái)、卣(yǒu)、斚(jiǎ)、盃(hé)、觚(gū)等青铜器。当时，青铜铸造工艺已然成熟，青铜材质的各式器具经常出现在祭祀、战争、宴饮等场合。青铜一般是铜锡或铜锡铅合金，导热性好，多种青铜器被用于烹饪、加热、保存食物和酒水。

尊是商周时期酒器、食器等礼器的通名，“尊”字早在战国时期就引申出了“尊敬”“敬重”的含义，延续至今。以是否有肩部为依据，尊被分为有肩尊和无肩尊。有肩尊既有圆尊，也有方尊，比如四羊方尊就是有肩尊；无肩尊一般是圆尊，比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种台的设计灵感来源何尊，就是无肩尊。

何尊底部篆刻的122字铭文，记述了周武王克商于殷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活动时发表的祷辞，以及周成王兴建新的都城成周城(今河南洛阳)并举行祭祀活动、赏赐臣民的事迹。其中，“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已发现最早关于中国的记载。

商周时期形似鸟兽的尊被称为“鸟兽形尊”，其呈现的鸟兽类型主要包括鸮、虎、象、犀、牛、羊、马、兔、神兽等。

妇好鸮尊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鸟形铜尊，纹饰繁缛，昂首挺胸，站姿挺拔，双翅呈蓄势待发之势，因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得名。鸮，即鸱鸺，是古人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由于昼伏夜出的习性及锐利的喙爪，这类鸟在古代被视为敏锐、智慧的象征。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生前曾参与国家大事，并征战沙场，这件出土自妇好墓的随葬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后人对墓主人的认可。

青铜爵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酒杯，常见器形为圆腹或方腹，口部有倒流的流槽，后部有尖尾或圆尾，下有长足。收藏于河南洛阳博物馆的夏代乳钉纹铜爵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之一，爵身呈“细腰瘦腹”状。商周时期的青铜爵厚重古朴，通常有乳钉、云雷、蕉叶等纹饰。爵上有两根短短的立柱，意在提醒饮酒之人注意仪态、浅尝辄止。

在商周时期，青铜爵作为贵族阶层使用的饮器，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正因如此，后来出现了“爵位”一词和爵位制度。商朝时，爵称和官称合一，分封制初步形成；周朝统治者进一步完善爵位制度，将其分为公、侯、伯、子、男等，建立了以分封制为核心的统治体系。

除了尊和爵，商周时期的饔、觚、卣均为盛酒器，盃为温酒器。其中，斚既可作盛酒器，又可作温酒器，通常和爵一起出现、配合使用，人们用它向爵内注酒。

古代

饮器之美

在文物大家族中，饮器是饮食器的一部分，狭义指饮酒器皿，广义则包含盛放饮料等其他液体的器皿。在《周礼·考工记》《战国策》《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饮器的记载。一些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饮器，之所以今天仍被大众知晓，主要缘于酒文化的影响力和名人佳句的“加持”，比如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苏轼的“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等。

回望千年可以发现，我国古代饮器的材质和特征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唐代素面水晶八曲长杯。

隋唐

流光溢彩的酒器

隋唐时期，我国对外贸易逐渐繁荣，大量的金银、玻璃、玛瑙器皿被引进。当时价格最昂贵的不是金银器，而是相对更稀缺的玻璃制品，拥有很多玻璃制品是身份尊贵的体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隋代的琉璃瓶，整体呈圆球形，浅绿色透明，瓶口为管状，瓶身饰有4个凸凹圆心的圆形，颇具美感。在隋唐时期，人们对玻璃材质的器具充满好奇，难怪有唐诗称赞玻璃制品“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是20世纪隋唐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该处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有一个镶嵌兽首玛瑙杯。这件饮器的材质是较为罕见的五彩缠丝玛瑙，油润细腻。工匠顺着玛瑙的自然纹理精心雕刻，以兽首为形，造型生动，将牛头和羚羊角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唐代镀金兽首玛瑙杯。



夏代乳钉纹铜爵。



宋代青白釉葵口托杯。

宋元

雅致的茶盏茶杯

宋代文人墨客好酒喜茶，他们在茶器方面颇为讲究，这一方面缘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与宋代盛行的点茶、斗茶等习俗对茶器要求较高也有一定关系。

宋人鉴茶、斗茶，要观察茶色、水痕等，黑釉盏有利于焕发茶色，成为最受欢迎的茶器之一。黑釉盏有兔毫纹、鹧鸪斑纹、树叶纹、油滴釉、玳瑁釉等肌理效果和纹饰类型，花样百出。其中，兔毫盏是宋代黑釉盏中最著名的品种，其盏身内外皆有棕色或铁锈色条纹，状如兔毛。在窑口方面，福建建阳窑生产的黑釉盏最为出名。

宋人还特别注重茶器的造型、色泽，希望在细节处体现自己的意趣、审美。茶瓶、茶盏、茶杯等的盖子、出水口常有修饰造型，色泽崇尚简约清雅。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个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葵口托杯，分为杯和杯托两部分，里外均施青白釉，釉色莹润，介于青白二色之间，又被称为“影青釉”。“影青”是宋代文人偏爱的一种颜色，它不仅出现在书画作品里，也凝固在茶器上，体现了东方人含蓄、典雅的审美情趣。河南博物院藏有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盏托，其圆形凸台四周有双层覆莲瓣形纹饰，用于承托盏身。

从青铜器到金银器、玻璃制品，再到陶瓷器、竹木器、漆器等，我国古代饮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今，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造型、色泽各异的器皿，仿佛可以看到他们斟酒啜茶、四季三餐的日常生活。



隋代琉璃瓶。（据《海南日报》）

瓷上石榴亦馋人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石榴因其寓意美好的特点，成为民间喜爱的象征物，也激发了历代瓷器工匠的创作灵感，使得石榴图案频繁出现在各种精美的瓷器之上，成为瓷器艺术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件石榴天球瓶，高约21厘米，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吸引了广大收藏爱好者。它直口长颈，溜肩鼓腹，胎质坚硬细腻，展现出清朝瓷器制作的非凡技艺。瓶身通体绘画自然逼真，工笔精细娴熟，仿佛能映照出岁月的痕迹与匠人的匠心独运。

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瓶身所绘制的石榴纹样。一株枝叶繁茂的石榴树傲然挺立，成熟的石榴缀满枝头，仿佛能闻到那阵阵甜蜜的香气。这一画面不仅布局精美，图案描绘也极为生动，让人不禁感叹于工匠们的巧思与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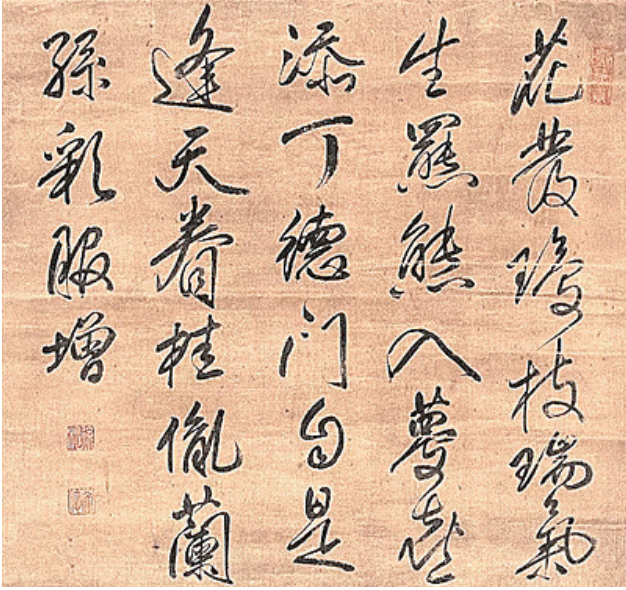
天球瓶又称“千秋瓶”，有“千秋太平”之寓意。这种直口、长颈、球形腹、圈足的球瓶瓷器造型，创烧于元代，明初一度断烧，明宣德年间再度烧成，直至清代仍有生产。因为圆球腹硕大，像是从天而降，故名。清代天球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与发展，特别是乾隆时期的天球瓶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这件石榴天球瓶以石榴为主题纹饰，构图精美，器型饱满大气，端庄而不失柔美，不仅寓意深远，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祝福。（据《联谊报》）



清代石榴天球瓶。

徐渭草书七言诗



徐渭为明代著名书画家，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能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据介绍，这幅草书七言诗的释文为“花发琼枝瑞气生，黑熊入梦喜添丁。德门自是逢天眷，桂胤兰孙彩服增。”其书法笔意刚劲，放纵恣肆，自成一格。（据《侨乡科技报》）

泉州清源山 有一“赐恩”石刻



“赐恩”石刻。

该石刻位于泉州清源山赐恩岩寺后岩崖间，镌刻竖写楷书“赐恩”，笔力遒劲，字姿豪迈。

据介绍，该石刻幅高宽为90厘米×40厘米，字幅高宽为40厘米×35厘米，无纪年题款。据明代史学家何乔远《闽书》记载，赐恩岩为唐代皇帝赐给刺史许稷的封地，因此得名赐恩岩。许稷，字君苗，于唐贞元十八年(802年)考中进士，曾任泉州刺史。（据《侨乡科技报》）

吴昌硕一方篆而未刻之印



吴昌硕“吴氏雍穆堂印”印石及反文墨稿。



篆而未刻的“吴氏雍穆堂印”印石，作为贺礼，捐献给西泠印社永久收藏。据当

时吴超接受媒体采访所言：“担心这方半成品印日后传到子孙手中，子孙不懂印事，若将印上字迹洗掉，则就毁了这件宝物。”吴家后人这种妥善的做法，令人称许。

此印，印面边长4.3厘米，高8.3厘米，青田石料，墨书反字印文，6字分三竖行排列，一行2字，每字间有界格。印文所谓“雍穆堂”，为1904年吴昌硕61岁后寓居苏州的一间堂名，“雍、穆”二字，乃雍容、静穆之意也。该堂舍原址在苏州桂和坊19号，吴昌硕在此处生活了近10年，并创作了不少书画、篆刻名作。不知何因，这方印章，篆而未刻。缶翁不经意留下的这件篆刻半成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其堂奥的独特视角。

篆刻，顾名思义，包括篆与刻两个部分。篆的部分，即是印式设计，一般可分为排置印文、经营虚实、完善整体

三个方面，章法合理与否，不但左右着印章的形式品味，还影响着作品的艺术质量。历来印人都重视印稿设计，有“七分篆，三分刻”之说。印稿设计大凡有三种方式：其一，先写印文于薄纸上，然后沾水将纸稿墨迹反印到印石上；其二，直接在印石上以反文书写印稿；其三，用刀角轻轻在印石上划出印文，或涂黑印面直接下刀刻制。从吴昌硕这方印的笔迹观察，他是以第二种方式书写印文，即用墨笔直接反写印文于印石上，但或许有个纸稿作为参照，这大概也是他惯用的方法。

吴昌硕恣情肆意的写意印风，在清末民国印坛上产生较大影响。1913年他被推举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成为篆刻界的领袖人物，实乃不负众望。纵观500年文人篆刻流派艺术史，缶翁治印，入古出新，开宗立派，影响深远。（据《联谊报》）